

# 徐学谟文学思想平议

王晴璐

**内容提要** 明代中后期嘉定文人曾在公安派之前激烈地批判拟古剽窃，而其中具有先驱性质的代表人物当属徐学谟。徐学谟的文学思想具有宗经崇古却又反对拟古的特点，别具一格，因此很难划入现有的明代文学流派中。受其影响较大的并非如黄淳耀所言为王世贞，而是娄坚、唐时升、程嘉燧等嘉定后学。正是在徐学谟的引领下，娄、唐、程等人能以嘉定古学及归有光文论为根底，成为唐宋派、公安派之外的一支反拟古的重要力量，并最终对钱谦益产生影响。

**关键词** 徐学谟 文学思想 反拟古 历史贡献

徐学谟（1522—1593），原名学诗，字叔明，一字子言，别号太室山人，嘉定（今属上海）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其文学创作主要有《徐氏海隅集》《春明稿》和《归有园稿》。徐学谟少时深受嘉定宗经崇古的传统学风影响，成年后又经历了后七子统治文坛的时期，且与后七子不少成员有交往，然而他一生都对后七子复古所带来的拟古剽窃之弊深恶痛绝，对其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批判，同时将归有光作品作为李、王作品的对立面，准确精当地给予赞誉。晚年归田后，徐学谟亦注意引导后学传承宗经崇古的嘉定学风，学习唐宋散文。徐学谟的文学思想与唐宋派及其后的公安派皆存在相通之处，却又不尽相同，其独特内涵与历史贡献值得我们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究。

—

徐学谟的文学思想首先表现为反对拟古剽窃，其三部作品集虽创作于不同时期，反对拟古剽窃的思想却一以贯之。徐学谟早在其第一部作品集《徐氏海隅集》中就指出，前七子的“亟于型范、薄于风神”，至后七子时已愈演愈烈，发展为“不病而颦、无从而涕”<sup>①</sup>的赝伪成风；在为他人文集作序时亦对不剽窃前人的作品极其褒奖，如“其文不为剽贼以苟应酬”<sup>②</sup>“文苑丽春容，不剽贼前人一语”<sup>③</sup>等。其《春明稿》创作于万历七年（1579）再度入京后，此时的徐学谟已对后七子复古流弊深恶痛绝，《春明稿》中的《斋语》仿佛声讨李攀龙、王世贞拟古流弊的一篇檄文，深刻犀利，痛快淋漓：

盛唐人诗止是实情实景，无半语夸饰，所以音调殊绝，有《三百篇》遗风。延及中唐、晚唐，亦未尝离情景而为诗，第鼓铸渐异，风格递卑，若江河之流，愈趋而愈下耳。……奈何近來作者綴成數十艷語，如“黃金”“白雪”“紫氣”“中原”“居庸”“碣石”“詩名”“劍術”之類，不顧本題應否，強以竄入，專愚聾瞽，自以為前無古人，亦可笑也。乃小兒效顰，輒引為同調，南

① 徐学谟《徐氏海隅集》文编卷五《刻〈骚选〉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版，集部第124册，第443页。

② 《徐氏海隅集》文编卷六《徐白谷先生集叙》，《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24册，第454页。

③ 《徐氏海隅集》文编卷六《华仪部集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24册，第461页。

北传染，终作疟风，诗道几绝矣！论者谓诗莫盛于今日而亦莫衰于今日，有识者能自辨之也。……元美每推于鳞，其五七言律诗，海内少年争附和之，至以其诗中所掇数字若“白雪”“黄金”“明月”“雄风”“中原”“北斗”“黄河”“碣石”之类传为家法，人人效颦，更不顾情景相对与否，此亦是障。即于鳞集试读其一二首，非不俊爽可诵，比至连篇，障语叠出，如巧线傀儡、学语鹦鹉，伎俩有限，不耐久玩，于唐人口头语、眼前景之指孰为深浅也？予持是说久矣，前岁至豫章，有宗人亦善诗，口占俚语一绝，后二句云：“近来莫怪黄金贵，因为诗人用得多。”则人已有厌之者。

对于复古派为文的宗尚“西京”，徐学谟亦借对归王公案的评论，赞归有光所长“正在澹然若不经意，而妙思溢发，有得于天理人情之极致者，元美不尽知也”，并进而云：

大都近来古文家动称“西京”，若能流自肺腑而法准西京，则诚西京矣。今恒订西京人语，勉强传今人，不论其人之肖与否，而一切为无情之词，文虽工，终不古于意，于世轻重何如也？熙父特偏于用宋，而晚年才退耳。若其集中得意者，尚在毗陵、晋江之上，而时论经学，本朝未见其人，何论后来少年也？元美每谈，独推让李于鳞，此似僧赞僧，意于鳞文，睡梦中呓语耳。绌绎之，无非扬己卑人，殊狂肆无状，古今岂有此作者？<sup>①</sup>

其矛头直指后七子领袖李攀龙、王世贞，对复古派在诗文方面的拟古恒订提出了尖锐的批判。在徐看来，李攀龙由于难脱拟古之习，且模拟的意象比较固定，以至诗作语言重复，给人黔驴技穷之感，“不耐久玩”。而其效颦者则模拟更甚，“不顾情景相对与否”，生搬硬套“白雪”“黄金”“明月”“雄风”“中原”“北斗”“黄河”“碣石”等语，乃至引来“近来莫怪黄金贵，因为诗人用得多”之诮。同样，在为文方面，李攀龙等人“动称‘西京’”，实则“恒订西京人语，勉强传今人，不论其人之肖与否”，因此“文虽工，终不古于意”。他对李攀龙及其追随者的弊病认识得极为透彻，批评颇中肯綮。除此之外，徐学谟还指出：王世贞指摘归有光散文，然其自身在《四部集》中所作序文却“靡不极口谀颂”，远不如归有光的“第摭己臆，略不为装饰半语”。而在晚年所作的《归有园稿》中，徐学谟亦抨击后七子的诗歌仅仅是“务极绮靡，争单词只句之雄，转相剽袭为名高”，只因“音响激越，殊愉快人耳”<sup>②</sup>而获得了大批追随者。而在《冯咸父诗序》中，徐学谟指出求名之心乃是滋生模拟剽窃的原因之一，所谓“自名胜而诗靡矣，靡生夸，夸生斗，斗生膺伪，滥觞至今，则有矫意安排而强相凑泊，合词剽袭而不厌雷同”<sup>③</sup>。

在后七子长时间掌控文坛的时代，与其领袖王世贞及其余多名成员有着交游的徐学谟能做到不附和，不为所动，深刻地指出拟古流弊，并与之斗争终身，实属不易。这也获得了其后学及后人的一致赞誉。如黄淳耀引徐学谟反拟古的主要观点，并评为“讥当世之镂琢言语，自号秦汉者”，指出“公与弇州为同年友，周旋四十年，持论断断不为之变”<sup>④</sup>。即使是对徐学谟创作成就评价不高的四库馆臣，亦不得不赞云：“学谟与王世贞里闰相近，而立论如此，颇不为习俗所染。”<sup>⑤</sup> 黄仁生教授更认为

① 徐学谟《斋语》，黄宗羲《明文海》卷四八〇，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册，第5167—5169页。《春明稿》文编除《斋语》一文外均佚，《斋语》因载于《明文海》而幸得保留。现存《春明稿》仅有诗编，共三卷，并附《填邸续稿》一卷。

② 徐学谟《归有园稿》文编卷二《周胤昌集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25册，第462页。

③ 《归有园稿》文编卷二《冯咸父诗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25册，第464页。

④ 黄淳耀《陶庵全集》卷八《徐宗题制义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版，第1297册，第738页。

⑤ 徐学谟《春明稿》附录《〈春明稿〉提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齐鲁书社2001年版，第97册，第429页。

徐在《春明稿·斋语》中对拟古流弊的批评“在袁宏道、江盈科之前，实无人可与伦比”<sup>①</sup>。

其次，徐学谟论诗论文皆以六经为根本，诗宗《诗经》，文崇七大家。必须指出的是，同是抨击拟古剽窃，徐学谟的文学思想却难称公安派之先驱，反对拟古者未必就持类似“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sup>②</sup>“古何必高，今何必卑”<sup>③</sup>的观点。徐学谟为汪道昆所作的《刻〈骚选〉序》是反映其文学思想的重要文献：

歙人中丞汪公守襄阳时，尝摘梁《昭明文选》中所载屈原、宋玉《离骚》《九辩》诸篇，至于刘向、王逸而止，诗自战国荆轲《易水》，迄于齐、梁间人，厘为五卷，名之曰《骚选》，刻置郡斋。盖中丞公之为襄阳也，余适待罪江陵郡，以于役郎中，尝从中丞公觴而得以下上其议论。……至抵掌艺园，诵法古昔，断自汉、魏，稍逮齐、梁，大历以下不论也。……中丞公所自为词赋，亦卓然绝不为唐人声偶之习，故刻是编以指南学者。……文字之肇，所从来远矣，然词家者流则言人人殊，何哉？《三百篇》尚矣，十三国之所陈多闾谈巷语，然今后世学士大夫有不能袭其一词者，何则？情之所至，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已降而为《骚》，几于怨矣；又降而为汉、魏五言，比于绮矣。然词尚体要，飒飒乎婉而则也，其风人之遗乎？厥后靡于唐，弱于宋，纤于元，浸淫于国初，诗道几亡矣！幸弘、德间二三君子相与切劘，力障其澜而趋之古，取战国、汉、魏、齐、梁人之所为，掇其英，咀其华，而组纆之，无遗巧矣。然当其时已有亟于型范、薄于风神之病，视大历以还不无少劣焉，岂世变之流真江河哉？乃今词家顾独昵其书，转相推窃，而断断曰“大雅在是”，若前之乎无有古人者。于是有“不病而颦、无从而涕”之语，于情之所至何当焉？……是编出，学者将弃去今人之所为，溯汉、魏以上薄《风》《雅》，词家渊璞，或于是乎？<sup>④</sup>

此处徐学谟在诗歌取法上较七子派竟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有“诵法古昔，断自汉、魏，稍逮齐、梁，大历以下不论也”之语，且持彻底的“格以代降”观，认为《骚》较《诗》为降，七子派崇尚的汉、魏古诗较《骚》为降，更遑论汉、魏之后的唐、宋、元及明初<sup>⑤</sup>！既然一代不如一代，则返诸汉、魏总较返诸宋、元为佳，故徐学谟肯定李、何的复古运动“力障其澜而趋之古”。较具慧眼的是，徐学谟指出前七子复古运动因当时“亟于型范”故有“薄于风神之病”，此正为后来“不病而颦、无从而涕”拟古流弊的根源。

这篇序文清晰地展现出徐学谟的文学思想乃源自嘉定宗经崇古的文化传统，以六经为根本，反对机械地拟古剽窃。由此，就不难理解上文所明确表示的对前七子复古运动的认同和褒扬，而徐学谟批评后七子乃因其时拟古之弊已到了“传为家法，人人效颦”“南北传染，终作痼风，诗道几绝”<sup>⑥</sup>的极

① 黄仁生《嘉定派的酝酿过程考论》，黄霖主编《归有光与嘉定四先生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41页。

② 袁宏道著，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卷四《叙小修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上册，第188页。

③ 《袁宏道集笺校》卷六《丘长孺》，上册，第285页。

④ 《徐氏海隅集》文编卷五《刻〈骚选〉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24册，第442—443页。

⑤ 前文已引徐学谟在《春明稿·斋语》中肯定“盛唐诗止是实情实景，无半语夸饰，所以音调殊绝，有《三百篇》遗风”，但同时说“延及中唐、晚唐，亦未尝离情景而为诗，第鼓铸渐异，风格递卑，若江河之流，愈趋而愈下耳”，晚年亦称赞杜甫诗歌“性情境界举归于真”（《归有园稿》文编卷二《冯咸父诗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25册，第464页），其在诗歌理论上始终未将宗法的下限划至中晚唐或宋元。较其后姜垓所云“宋人之诗高者固多”（姜垓《学古绪言》卷二三《草书东坡五七言各一首因题其后》，《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5册，第271页）及“予以为苟出于杰然超然，则虽宋，与汉唐作者何异”（《学古绪言》卷二三《题草书杜诗后》，《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5册，第269页），显得取境较窄，而与复古派的诗歌取法接近。

⑥ 《斋语》，《明文海》卷四八〇，第5册，第5168页。

端境地。以六经为根本的文学立场决定了徐学谟虽然反对拟古剽窃，却绝难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sup>①</sup>这样革命性的见解。

徐学谟论文同样以六经为根本，之所以倡导唐宋散文，乃因其视唐宋散文为六经的载体。他说：“宇宙文章，权兴于六经而其精华尽发于七大家，乃今人顾鄙薄之，自生一种剿袭口声，可厌之甚。读书除头绝尾，止看《史记》《文选》，已非上下古今胸次，若并弃之，而倚办近人古文为套，亦足耻也。”<sup>②</sup>关于这一点，娄坚于《祭徐大宗伯文》中有明确的总结，娄云：

吾侪侍公，学焉就正。八珍一啻，偶沾残剩。公顾解颐，留连觞咏。曰古文词，灿然纬经。唐宋诸贤，六经胎孕。今之词人，妄生讥评。斥远姬姜，昵近婢媵。讹种相承，口舌难胜。犹望后生，无售昏镜。<sup>③</sup>

“曰古文词，灿然纬经。唐宋诸贤，六经胎孕”四句清晰地指出了徐学谟沿唐宋而返六经并以六经为根本的文论思想。这与唐宋派有相通之处，与公安派存在较大差距。黄毅教授指出，“公安派是彻底的反复古论者”，而“唐宋派虽然反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却又以唐宋之文为鹄的，并上溯到六经、《诗经》，仍未摆脱贵古贱今的观念”<sup>④</sup>。因此，尽管徐学谟的文学思想与唐宋派存在较大的差异<sup>⑤</sup>，但在散文观上无疑又是接近唐宋派的，即：唐宋、秦汉环环相扣，作为回归六经的途径皆不可或缺，而宋为学秦汉之径。例如他说：“然每揭宋人大家文字，今人尚不能缀一语，何孟浪谈《史》《汉》？”<sup>⑥</sup>且唐宋大家学《史》《汉》是得其神理的，例如他说：“昌黎大家，其文不模《史》《汉》，而自得其精神。”<sup>⑦</sup>冯时可于《徐先生海隅集序》中有较详尽的转述：

冯时可曰：文章之为用也，法必古程，机贵神解，法出于古，非古人自法也，物之有则，开阖自然，天为之创；机出于我，非我私臆也，匠之照矩，尺寸不爽，神为之尸。运我之神，法古之法，精诣而不偏驰，高武而不浚逐，斯士之孤出独树者也，由汉以来，代有几人？司马迁、班固、韩愈，其著者。迁不剽先秦而能先秦也，固不剽西京而能西京也，愈不剽《史》《汉》而能《史》《汉》也。运我之神，法古之法者也；孤出独树，而不数数循世者也。宋元以降，学士大夫贪凡嗜浊，匪北地其波哉？无奈何恢弘其绪者之窃影逐响而又以横睨天下也！先生悍然非之，曰：“彼夫也，枉麻而效组纆者也。古于声，不古于调，即汉、魏、盛唐奚为？古于词，不古于意，即先秦、两汉奚为？”是论出，豪者睚眦矣。先生视之亡如也，既而曰：“世瞽焉放矣，燥吻无益，于俗不信，徒取惑耳。”乃噤不言，而益自肆。集成若干卷，时可以间寓目焉。……徐而探之，结幽构眇，章妥句适，乱而复理，吐而能含，扬而或抑，浅而弥深，促而愈缓，尽而且余，臻西京之轍，蹈建安之境，而并其境与轍泯矣。昌黎、北地且逊武乎，去晚近世千里矣！盖先生不事剽模，匠神隶法，法至则天契，神来则法合，以我古而非以古为古也，所谓孤出独树，不数数然循

① 《袁宏道集笺校》卷四《叙小修诗》，上册，第187页。

② 《归有园稿》文编卷二二《与郭美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26册，第46页。

③ 《学古绪言》卷一三《祭徐大宗伯文》，《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5册，第162页。

④ 黄毅《唐宋派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06页。

⑤ 此差异主要体现在对阳明心学的不同态度上，心学为唐宋派文学理论的哲学基础，然徐学谟却与归有光相似，批评阳明心学的空疏，曰：“所谓灭裂者，南场更甚耳。良知之说自是阳明私家门户，安可上诬孔子《论语》，教人何处不言闻见？盖闻见之知即德性之知，初非二物，如今人放花炮必用引线，引线之药即花炮中之药，若无所缘则无所入。空山中有哑夫妇，生子期而不能言，何也？以有所见无所闻也。故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孔子以为贼人，而今欲剿私家之说贼天下，何哉？人心蒙昧至此，诚不知世道所终也。”（《归有园稿》文编卷二一《与沈练城二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26册，第36页）

⑥ 《徐氏海隅集》文编卷二六《复殷无美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24册，第683页。

⑦ 《归有园稿》文编卷一一《尘谐》，《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25册，第595页。

世者也。彼睢盱者日持古之三尺以绳今世，而决裂短钉，益卑卑尔。<sup>①</sup>

从冯时可对徐学谟“运我之神，法古之法”“不事剿模，匠神隶法，法至则天契，神来则法合，以我古而非以古为古也”及“臻西京之辙，蹈建安之境，而并其境与辙混矣”的称赞中可以看到，崇古与拟古是完全可以区分开来的，崇古而绝不拟古，正是徐学谟的特出之处，冯时可的转述与徐学谟的文学思想无疑是吻合的。当然，值得一提的是徐学谟在宗经崇古的同时也指出了真情实感对于创作的重要性，认为“若能流自肺腑，而法准西京，则诚西京矣”<sup>②</sup>，强调了情感与法度的统一。在《复屠青浦》一文中，徐学谟也谈到复古之作无法感人，正因其为模拟而凭空编造，并非出于真实的情境。他说：“古之人皆有其事而言之，今之人无其事而亦言之，如婴儿学语，初不当于名实，暂听之可喜，久则厌之矣。”<sup>③</sup>

再次，徐学谟推崇的是“审于性情之正”“归于温厚和平”的正统文风，尽管对真情有所赞许，但以《诗经》为最高典范，必然退至“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对情感加以节制，徐学谟《刻〈宋布衣集〉后》云：

诗故难言，而言诗于今之世尤难。《诗》之教，要于温厚和平，凡以正得失、感鬼神、动天地，皆是物也。仲尼删《诗》，悉取十三国之风而陈之，独秦风悍急耳。说者以为雍州之人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驺虞》《小戎》，盖存其俗也。乃《蒹葭》三章，又未尝不婉而致矣，宁独矜其“猗猗”“騶骺”“舍拔”“同仇”之雄已哉！唐人律诗，原本于温厚和平，惟少陵刻意险峻，往往化臭腐为神奇，视蓝田诸家已别为宗派，固秦声之滥觞矣。至明兴，弘治间北郡崛起，思厉颓靡，则又尽剿杜词，凌压当世，轩轩然其招八州、朝同列之侈心乎。夫要眇之音希合，而悍急之气易扬，有以张之，势弥竞耳。故后来更霸，争主夏盟，掉吻升坛，一呼响应，挥霍词林，古人左次矣，不其伟哉！顾雅道几微，悬衡什伯，圣人不作，安所取衷？吾又疑夫今之得于快意而失于平情也。夫诗必于快意而不必于平情，则秦声吾无间然矣；如必于平情而不必于快意，则仲尼所谓“可兴”“可观”“可群”“可怨”“正得失”“感鬼神”“动天地”者，要自有在，未可举一而废百也。夫少陵、北郡故皆秦人也，其为秦人也者，而为秦声可也；其不为秦人也者，而欲驱一世而尽为秦声，谓之何哉？假令秦声而可为也，仲尼不置之变风矣。而二南之正始，胡乃有取于《关雎》《鹊巢》之雍容也？夫其为秦人而为秦声也，且不可以始风，而况影响假借，又不能真为秦人之声者哉？吾是以知言诗于今之世尤难也。吾尝与宋布衣言诗，布衣言“今人无诗”，意甚怪之。比读其诗，稍工五律，寂寥短章耳，辄病其才力之易诎。布衣曰：“吾幸以才力之诎，故得沉思苦吟，审于性情之正，以求归于温厚和平。彼方伤于所恃，能无穷大而失其居乎？”吾始矍然曰：孔子云“以约失之者鲜矣”，其布衣之诗之谓哉？今其诗具在，诚无当于倚马千言郎，以其沉思苦吟之片语，杂今之倚马千言中，则炯然古人之流沫矣。吾不意当《驺虞》《小戎》“舍拔”“同仇”之际而复见《蒹葭》之“伊人”也，乌可使之无传乎？<sup>④</sup>

在徐学谟看来，若以《诗经》的“温厚和平”为准绳，则杜甫的律诗及其学习者李梦阳的作品（徐认为其“尽剿杜词”）无不“得于快意而失于平情”。徐推崇的是要眇、婉约、雍容、“审于性情之正”“归于温厚和平”的正统风格（需要指出的是，徐学谟认为宋登春的诗堪为楷模，这其实并不符合其创作实际，宋作中仍较多饱含情感与生命力的作品），而非酣畅淋漓的感情倾泻。因而在他看来，即使

① 《徐氏海隅集》附录《徐先生海隅集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24册，第222—223页。

② 《斋语》，《明文海》卷四八〇，第5册，第5168页。

③ 《归有园稿》文编卷一六《复屠青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25册，第645页。

④ 《徐氏海隅集》文编卷五《刻〈宋布衣集〉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24册，第448—449页。

是《骚》亦较《诗》为降，因其“几于怨矣”<sup>①</sup>，违背了温柔敦厚的诗教，这与归有光在《陶庵记》中批评司马迁《史记》“感慨激烈、愤郁不平之气，勃勃不能自抑”及赞赏陶渊明的平淡冲和何其相似。归氏云：

余少好读司马子长书，见其感慨激烈、愤郁不平之气，勃勃不能自抑。以为君子之处世，轻重之衡，常在于我，决不当以一时之所遭，而身与之迁徙上下。设不幸而处其穷，则所以平其心志，怡其性情者，亦必有其道。何至如闾巷小夫，一不快志，悲怨憔悴之意，动于眉眦之间哉？盖孔子亟美颜渊，而责子路之愠见，古之难其人久矣。已而观陶子之集，则其平淡冲和，潇洒脱落，悠然势分之外，非独不困于穷，而直以穷为娱。百世之下，讽咏其词，融融然尘渣（渣）俗垢与之俱化。信乎古之善处穷者也！<sup>②</sup>

除反对激烈的情感表露外，提倡宗经学古的两人亦皆反对华丽的词藻。在归有光看来，七子追求的根本不是秦、汉的古朴，而是齐、梁的华艳，在《沈次谷先生诗序》一文中，归有光抨击七子派“乃惟追章琢句，模拟剽窃，淫哇浮艳之为工，而不知其所为，敝一生以为之，徒为孔子之所放而已”<sup>③</sup>，在《与沈敬甫》中亦云七子“以琢句为工，自谓欲追秦、汉，然不过剽窃齐、梁之余，而海内宗之，翕然成风，可谓悼叹耳”<sup>④</sup>。同样，除指出拟古剽窃之弊外，与徐学谟对七子诗“务极绮靡”的批判角度一致。

当然，徐学谟因反驳王世贞而对归有光散文所作的评点堪称知音，前文已引：“但不知熙甫之所长，正在澹然若不经意，而妙思溢发，有得于天理人情之极致者，元美不尽知也。”<sup>⑤</sup>此为其文学思想中最具真知灼见的内容之一，对唐时升、娄坚等嘉定后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后来，唐时升在代王锡爵所作的《太仆寺丞归公墓志铭》中评归有光“所为抒写怀抱之文，温润典丽，如《清庙》之瑟，一唱三叹，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语之外”<sup>⑥</sup>，此向为评价归文的经典之论。由“不经意”到“无意”，颇可见徐学谟观点的影子。徐学谟在对归有光散文的评价与推广上所做的贡献应该获得充分的重视。但同时也必须看到，《春明稿·斋语》中，徐学谟首先赞赏的是归有光散文的“澹”，这与归有光对陶渊明的赞赏极其相似。在徐学谟看来，归有光淡泊雍容的文风无疑是最合温柔敦厚之道的，这与袁宏道所言的“情随境变，字逐情生，但恐不达，何露之有”“穷愁之时，痛哭流涕，颠倒反覆，不暇择音”<sup>⑦</sup>恰巧相反！徐学谟与归有光终究没有摆脱正统文学观的桎梏。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徐在批评李攀龙律诗后抬出的典范却是高岑王孟之“淡语”（事实上并不完全符合高岑创作的实际），而非同样“流自肺腑”却饱含生命激情的作品。

## 二

前文已叙，尽管徐学谟的文学思想与唐宋派存在相通之处，却又不能简单划入其中，更难称公安派之先驱，对其历史贡献必须作客观认识。

论及徐学谟文学思想的历史贡献，其后学黄淳耀在《徐宗题制义序》中对徐学谟的评价不可不

① 《徐氏海隅集》文编卷五《刻〈骚选〉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24册，第442页。

② 归有光著，周本淳校点《震川先生集》卷一七《陶庵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上册，第426页。

③ 《震川先生集》卷二《沈次谷先生诗序》，上册，第30页。

④ 《震川先生集》别集卷七《与沈敬甫书》，下册，第869页。

⑤ 《斋语》，《明文海》卷四八〇，第5册，第5168页。

⑥ 唐时升《三易集》卷一七《太仆寺丞归公墓志铭》，《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集部第178册，第215页。

⑦ 《袁宏道集笺校》卷四《叙小修诗》，上册，第188—189页。

提。黄氏云：

嘉、隆之间，吾嚆大宗伯徐公以文章政事名天下，公之言曰：“文自六经至七大家而精髓始尽，剿贼者遗其首尾。”又曰：“昌黎文不模《史》《汉》而得其精神。”又曰：“古于辞而不古于意，如夏畦之学汉语。”盖其意以讥当世之镂琢言语、自号秦汉者。公与弇州为同年友，周旋四十年，持论断断不为之变。弇州晚年颇好唐宋，而不薄归熙父，则亦自公发其端云。尝叹公以元老巨人为世推重，即无文章，已足不朽；乃其砭陋起衰如此，此徐氏之家学所以暗而益章、久而滋大也。<sup>①</sup>

黄仁生教授也指出，徐学谟“在《春明稿·斋语》中首次就归、王公案发表意见，既为归打抱不平，并予以公正评价，也指名批评了王世贞、李攀龙等人的弊病，并进一步阐明自己的主张”<sup>②</sup>，“众所周知的《归太仆像赞》和《书归熙甫文集后》二文，则皆是在受到徐的批评后所作”<sup>③</sup>。然而所谓“弇州晚年颇好唐宋，而不薄归熙父，亦自公发其端云”的断言是否站得住脚，颇值得商榷。

首先，王世贞晚年是否真正从内心深处“不薄归熙父”，是值得怀疑的。钱锺书先生已指出：“世人据弇州题《归震川遗像赞》中‘千载惟公，继韩欧阳。余岂异趣，久而始伤’，以为弇州知韩文之妙乃晚年事，盖未详考。又以为弇州心折震川，推之冠一代人文，亦不甚确。《读书后》卷四《书归熙甫文集后》自记与震川抵牾事颇末，又曰：‘观其遗集，故是近代名手。所不足者，起伏与结构。’又《书洵词》云：‘读归熙甫时义，厌其不可了，若千尺线。’桐城末派颂说归方，误以弇州老去之公心，为才屈之降款，加之钱牧斋记事失实，资其传说。故略订正于此。”<sup>④</sup>的确，王世贞《书归熙甫文集后》中仍然不乏对归有光散文的批评，即使是《归太仆像赞》中的称誉也显得有限和保守。因此，学界普遍认可钱锺书先生所说的“弇州晚年虚骄气退，于震川能识异量之美，而非降心相从”（《谈艺录》补订本，第386页），即实际上王世贞始终对归有光的评价都不高。而黄仁生教授亦认为王世贞在《书李于鳞集后》中明确表示的对“徐子言之恶于鳞著之书”“不伏”“才是其晚年真实的态度”<sup>⑤</sup>，那么对于被徐学谟树为李攀龙对立面的归有光，很难想象王世贞能真正心服。徐学谟对王世贞晚年思想有着发端作用的说法较难成立。

另外，徐学谟在文学思想与文学创作上存在缺陷，是王世贞难以心服的深层原因。对于同样对拟古有批判，指出“剽窃模拟，诗之大病”<sup>⑥</sup>的王世贞，徐学谟要真正使其心服，须有更深入全面的正面立论。遗憾的是，徐未有类似王世贞《艺苑卮言》那样全面阐述自身文学思想的理论著作，在宗经崇古、批判模拟剽窃之外，未能在诗体、诗艺、文法等诸方面提出更为深入的见解。同时，徐学谟创作实绩有限，佳作不多，较之其文学主张的尖锐犀利显得说服力不足<sup>⑦</sup>。因此，尽管王世贞在写给徐

① 《陶庵全集》卷八《徐宗题制义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7册，第737—738页。

② 《嘉定派的酝酿过程考论》，《归有光与嘉定四先生研究》，第140页。

③ 《嘉定派的酝酿过程考论》，《归有光与嘉定四先生研究》，第142页。

④ 钱锺书《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4—65页。

⑤ 黄仁生教授甚至认为，王世贞“隐忍未发”“强颜为欢”的原因在于“王世贞、王锡爵以县阳子化事于万历九年六月遭台谏论劾，曾请徐学谟从中斡旋，才得以平息。稍后，徐虽辞官归里，王世贞仍与之相期会面，诗书往返，则与当时首辅申时行乃徐之亲家不无关系。王以前因与同年张居正有隙而长期失意，此时由长洲人申时行秉政而尚存东山再起之望”，即“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而息事宁人”（参见《嘉定派的酝酿过程考论》，《归有光与嘉定四先生研究》，第142—143页）。

⑥ 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第66页。

⑦ 例如对李攀龙七律拟古之弊批评甚重的徐学谟，自身的七律却仅有《游大岳诗十首》等少数佳作，另有相当一部分为应制诗，总体上远未形成特色，而李攀龙七律虽缺陷明显，成就亦突出，此为当时人及后人所公认。且总体而言，徐学谟诗歌艺术成就不高，局限明显，其《春明稿》充斥着大量应制诗，晚年的《归有园稿》又有不少戏作，颇似打油诗，唯一尚存一些佳作的仅有《徐氏海隅集》，总体上诗集含金量不高。徐学谟的创作实绩，实难与李攀龙抗衡。

学谟的信中常称颂徐的文学成就,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王的《艺苑卮言》与《明诗评》涉及诸多明代文人,却皆无徐学谟之名,极可能是在王世贞看来,徐学谟的创作实绩仅属平平的缘故。

其次,郑利华教授在《王世贞年谱》中将《书归熙甫文集后》系于万历八年(1580),早于万历十一年(1583)在北京刊行的《春明稿》<sup>①</sup>;黄仁生教授亦谈到“他的《春明稿》写于礼部尚书任上,于万历十一年在北京刊行,其影响力自不可低估。当时赋闲在家的王世贞读后,不仅隐忍未发,而且强颜为欢,随即致书《徐宗伯》”<sup>②</sup>,亦认为王世贞读到《春明稿》当在万历十一年之后,如此则文章受徐学谟影响而作实难以成立。且王世贞《徐宗伯》云:“《斋语》一二则纵有异同,亦复何害?况弟数年来甚推轂韩、欧诸贤,以为大雅之文,故当于熙甫不薄,第无繇相闻耳。”<sup>③</sup>王世贞辩称自己这些年已在“推轂韩、欧诸贤”与“不薄归熙甫”,只是徐学谟并不知道罢了,由此亦可知“颇好唐宋”是王世贞已有的事,并非由徐学谟“发端”,《书归熙甫文集后》亦非受徐学谟批评后而作。

再次,王世贞在《归太仆像赞》中的“余岂异趋,久而始伤”之语引出了后人对所谓王世贞“晚年自悔”公案的争议。而与徐、王均有较密切交往,与徐学谟尤其亲近,晚年几乎随侍左右的娄坚恰为此文的书写者。其《归太仆应试论策集序》也对归王公案有一段叙述:“先生尝为人序,其文中有‘妄庸’之讥,或曰‘妄诚有之,未必庸也’。先生曰:‘子未之思耳,唯庸故妄,唯妄益庸。’闻者莫不心厌焉。当是时,吴之以高文称者曰王司寇元美,其始不无异同。及归自留都,从其家求画像,摹为小幅,系以传赞,属余书之,盖曰:‘千载有公,继韩欧阳,余岂异趋,久而始伤。’<sup>④</sup>而司寇季子时为余言:公之归也,尝读苏《应诏》诸篇,顾语之曰:‘此乃可谓策耳,余晋楚录文岂能及哉?’予以是叹服司寇晚年识益高而心益下,盖如此而世之君子或未必知也。”<sup>⑤</sup>这里,娄回顾了归、王之争,谈到王世贞晚年的改变。试想,若王世贞真的是在徐的影响下才发生转变的,以娄与王、徐二人的熟悉程度及其对徐学谟的追随与景仰,作为像赞书写者的娄坚不该不指出此关键的一点,但娄却只字未提,仅认为此乃王世贞“晚年识益高而心益下”。而在徐学谟去世后娄坚所作的对徐学谟影响与功绩作详尽称颂的《祭徐大宗伯文》中也找不到任何相关记录。

王世贞晚年的思想确实发生了程度有限的转变,这一点学界是达成一致的。而对促成这一转变的原因,王世贞的研究者们也都有分析。例如,魏宏远博士引述王锡爵在《弇州续稿序》中所云的“迨其晚年,阅尽天地间盛衰祸福之倚伏,江河陵谷之迁流,与夫国是政体之真是非,才品文章之真脉络,而慨然悟水落石出之旨于纷浓繁盛之时。故其诗文尽脱去角牙绳缚,而以恬淡自然为宗”及其信奉晏阳子事,认为王世贞晚年的转变是在“遭挫折磨砺”与“笃信仙道”两个因素作用下发生的自然转变<sup>⑥</sup>。郦波教授亦认为:“王世贞中年以后,目睹国难,饱尝家恨,在人生旅途上‘多历情变’,人生的坎坷与磨难使他的阅历与认识都日益丰富与深刻,体现在文学的创作与思想领域,则表现出极具发展性的特点。”<sup>⑦</sup>总之,徐学谟并未被王世贞的研究者们列入使王转变的原因中。

那么,徐学谟文学思想的历史贡献究竟何在?笔者认为,尽管徐学谟的尖锐批评拟古之论对王世

① 郑利华《王世贞年谱》,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78页。

② 《嘉定派的酝酿过程考论》,《归有光与嘉定四先生研究》,第142页。

③ 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卷一七五《徐宗伯》,《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4册,第514页。

④ 娄坚亦自“千载有公”引起,可知所谓断章取义,易给人造成“千古一人”错觉的引法非自钱谦益始。

⑤ 《学古绪言》卷一《归太仆应试论策集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5册,第11—12页。北京认为包括《归太仆像赞》在内的《吴中往哲像赞》为王世贞“在归有光死后不久作”(参见北京《归有光研究》,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9页),即隆庆五年(1571)后不久。郑利华教授《王世贞年谱》未对此文进行明确系年。据娄坚所云的“归自留都”,参之王世贞生平经历,则《归太仆像赞》的写作时间亦可能在万历十七、十八年间(1589—1590)。

⑥ 参见魏宏远《王世贞晚年文学思想研究》,复旦大学2008年博士论文,第121页。

⑦ 郦波《王世贞文学研究》,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87页。



贞确实造成了一定的心理冲击，但其时包括王世贞在内的复古派文人亦已有类似反思，再加上徐学谟未能以足够多的优秀作品来支撑其观点，因此其文学思想远谈不上促成了王世贞晚年的转变。受其影响较深、真正从内心深处佩服归有光并将之作为师法对象的亦绝非王，而是娄坚、唐时升、程嘉燧等嘉定文人。因此，徐学谟文学思想的历史贡献主要表现为：引领娄坚、唐时升、程嘉燧及其后的嘉定文人去认识与传承归有光的文论精髓，对嘉定地区宗经崇古文化传统的延续起到重要的作用。娄、唐、程等人的文学思想无不遵循宗经崇古、反对拟古剽窃、学古人之神、推崇唐宋七大家的核心理路<sup>①</sup>。对于这种环环相扣的传承关系，钱大昕叙述得十分清晰：

嘉定濒海小邑，无名山大川之胜，其在赤县神州中，仅如太仓之稊米。且建县于南宋，宋元以前，未有文人士、故家流风之遗也，士大夫多循谨朴鲁，仕宦无登要路者。然自嘉、隆间，海隅徐氏及唐、娄、程、李、严诸君，敦尚古学，其后黄忠节公文章气节，照映千古。<sup>②</sup>

嘉定文人作为一支批判拟古剽窃的重要力量，最终对钱谦益文学思想的转变起到重大的作用<sup>③</sup>。另外，徐学谟较早地道出了归氏散文的长处，当为唐时升著名评价的理论源头，对后世文人理解、把握归有光的文学成就贡献极大，应该给予充分的重视。

徐学谟站在宗经崇古立场上的反拟古思想显得较为保守，因而在文学史上影响有限。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复古流弊愈来愈清晰的嘉万文坛急需的是一种全新的文学观与创作面貌。仅对复古弊病进行尖锐抨击却缺乏真正革命性、创造性的文学思想，同时也未能以足够优秀的创作来支撑其观点<sup>④</sup>，是远不能符合要求的。这一历史任务最终要待徐学谟之后的公安派来完成。但徐学谟这一个案的独特性与复杂性仍然为明代文学思想研究注入了一些新的视角。他的观点虽非前无古人，但毕竟代表了来自复古派与唐宋派之外、与其后的公安派亦不尽相同的嘉定文人的声音，对后期始终在吴中扩大影响力的王世贞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心理冲击。而其晚年在文学上引领娄坚、唐时升、程嘉燧等人“学焉就正”，亦使他们能以嘉定古学及归有光文论为根底，成为唐宋派、公安派之外的一支批判拟古剽窃的重要力量，并最终对钱谦益产生影响。惯常的文学研究总有将这些独特的人物或文人群体拉入各种已有派别的倾向，如颇受争议的将归有光划入唐宋派的做法。同样，徐学谟有反拟古思想亦绝非公安派先

① 如唐时升云：“然造次之间，杼轴于中，必矩矱于古人。”（《三易集》卷九《程孟阳诗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78册，第128页）侯桐曾于《三易集·小序》中转述其语曰：“学秦汉者定非秦汉，而韩、欧、苏、曾诸大家不袭秦汉之迹，而专肖其神。”（《三易集》附录《小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78册，第13页）娄坚将自己的散文集命名为《学古绪言》，集中云：“予自中年后颇知好古，读古人之文，知其所自得皆高雅，不同于流俗。又证以所闻于长者，乃知近世所号为古文词，直以应俗而已，未可言文也。凡为此者，失不能识真故耳。”（《学古绪言》卷二三《书杂录唐宋诸家论文简牍后》，《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5册，第270页）又：“予以为苟得古人之意，虽降而应试，不害为古，不然即规摹秦汉，要为世俗之文耳。”（《学古绪言》卷一《归太仆应试论策集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5册，第11页）程嘉燧曰：“盖诗之学自何李而变，务于模拟声调，所谓以矜气作之者也；自钟、谭而晦，竞于僻涩蒙昧，所谓以昏气出之者也。”（程嘉燧《耦耕堂集》文集卷上《程茂桓诗序》，《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67册，第138页）

② 钱大昕《嘉定钱大昕全集·潜研堂文集》卷二六《习庵先生诗集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9册，第416页。

③ 但钱谦益对徐学谟的态度令人费解，黄仁生教授已指出：“钱谦益在《列朝诗集》中所撰长达2000字的《鹅池生宋登春》小传，系大段抄录徐学谟《海隅集》文编卷一五《鹅池生传》和《归有园稿》诗编卷五《悼往诗序》而凑成，此可确证他读过《徐氏海隅集》和《归有园稿》，但其所撰《徐官保学谟》小传，仅126字，纯粹只记述生平仕履，而对其诗文未作任何评价。”“这种对于历史上实际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和事件有意淡化乃至抹杀，正是钱谦益歪曲历史时惯用的狡黠手法之一。”（参见《嘉定派的酝酿过程考论》，《归有光与嘉定四先生研究》，第137页）

④ 归有光的文学观同样偏于传统，创造性不足，但其有相当数量的优秀作品，尤其是抒情散文，这些作品本身的成就与魅力已足以证明何为真正的性情之文，亦在无意中形成对其文学思想的超越。

驱,简单的派别归类及制造“拟古”与“反拟古”的二元对立确实有利于文学史的梳理与记忆,但却是对研究对象的独特性与复杂性的忽视。以徐学谟为重要代表的嘉定文人在文学思想上自成一格的独特性理应获得承认,这一文人群体对文学史走向的影响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作者简介] 王晴璐,女,复旦大学档案馆馆员。发表过论文《试论刘基的咏怀诗》等。

(责任编辑 马 昕)

· 学术信息 ·

## “历史传统与当代语境——《陈伯海文集》 出版座谈暨学术研讨会”召开

日前,《陈伯海文集》六卷本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为传扬陈伯海先生的学术贡献,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2015年5月9日,“历史传统与当代语境——《陈伯海文集》出版座谈暨学术研讨会”在上海社科国际创新基地举行。

会议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上海师范大学共同承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等高校、科研机构的六十余位学者代表出席会议。会议由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荣跃明副所长主持。会上,陈伯海先生以“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为题,回顾了自己的学术道路,概述了个人在学术活动中的思考与探索,亦即主要着眼于学术传统的推陈出新,通过开发、激活历史资源以创建民族新文化与新学术理念的问题。与会学者围绕陈伯海先生的学术成就,在中国古代文学、美学与哲学等相关领域展开了为期一天的研讨。研讨内容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古典文学研究方法的理论与创新。胡明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从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西方文艺理论的中国化以及唐诗文学理论化等三个方面阐述陈伯海先生学术研究的里程碑意义。董乃斌教授(上海大学)总结陈伯海先生研究的四个特点——“终极关怀,独立思考,重视理论,系统设计”,以文献研究为基础,微观、中观和宏观研究有机结合,形成一个严整的思想系统。陈尚君教授(复旦大学)阐述了正在编纂中的新定全唐诗之研究思路和方法,并提交了重新校定的唐诗名篇文本。刘跃进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指出当代古典文学研究最大的问题是缺失理论、方法与个性,知识分子的使命不仅仅是传递知识,更重要的是要传递思想,而思想应当是超前的。谭帆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以陈伯海先生的研究为标杆,返观近二十年来的古代文学研究,指出目前的古代文学研究亟需理论意识和方法论意识。

二、古代文学与哲学相关领域的专题探讨。胡晓明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以诗意的题目“不信春风唤不回”,讨论华夏优美经典的当代激活问题。张寅彭教授(上海大学)联系陈伯海先生编著的《唐诗汇评》,讨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唐诗学研究体系。陈超南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讨论了陈伯海先生所著哲学著作《回归生命本质》的意义与内涵。陆晓光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从陈伯海先生的“至老弥坚”,联系王元化先生的思想,予以阐发。

与会学者高度肯定陈伯海先生不断创新的学术志向和精湛丰硕的研究成果,围绕如何激活历史资源以创新文化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共同探讨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方向和道路。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朱 红)